

管窥科技与诗之间的“战斗”关系

文 / 田 榕

摘 要：在现代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一切科学领域的发明、发现、进展都被社会大众顺其自然地理解为人类福音，而诗、诗人以及一切和诗有关的事物则似乎同样顺其自然地被“边缘化”。有人认为科技同诗歌的关系是载体与内容、工具与目的的关系，可利用，无冲突，事实并非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讲，科技的本质乃是“反诗”的，科技与诗或许根本就是人类脚下偶有交叉但目的地根本不同的两条道路。

关键词：诗；科技；边缘化

DOI:10.16129/j.cnki.mysdx.2016.11.013

这不是一个诗的时代，或者更准确地说，这是一个诗人获得名望、成功比历史其他时期都要困难的时代。2016年2月12日，中央电视台一套开播了大型全民参与类诗词节目——《中国诗词大会》。平心而论，无论从整体创意、流程安排，还是徽标、舞台背景等细节设计，《中国诗词大会》整体应该可以称为一档比较精彩而且精美的电视节目，节目中的选手至少在诗词了解程度方面，表现得也确实比较优秀。

然而，不管这档节目多么热播，多么成功，它恰恰证明今天不是一个诗的时代。在这档央视节目光鲜绚丽的背后，有着不同时代审美趣味的较量，有着当下主创者与普通民众关于价值、趣味引导的较量，更有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科技”与“诗”的较量，甚至是战斗。

一、战斗

（一）呐喊

这种战斗的声息，首先表现在双方的呐喊上。一方面是科技本身对自己优长的强力而夸张的宣传，另一方面是诗歌本身不情愿“被边缘化”而发出的抗议或正当的自我宣传。前者诸如我们身边各种光怪陆离、魅人心神的广告——一个美女手中闪闪发光的液晶笔记本，或者一个帅哥掌中的超酷的时尚电子书，仿佛我们在拥有那个本本的同时能拥有那位美女或帅哥；抑或一家个个喜上眉梢的老老小小，拿着麦克风在光彩绚丽的电视机屏幕前翩翩起舞，尽情高歌，仿佛我们拥有了此款影碟机就拥有了幸福的婚姻、幸福的童年甚至晚年——我们也许没有理由说这些科技产品的宣传是针对于“诗歌”的“竞争”，但至少于客观效果上，这些声音确实“成功”加剧了“诗歌”边缘化的趋势。

而另一方面，来自诗歌的“呐喊”则显得复杂许多也直接许多，这些声音一方面表现为某某诗作研讨会、某某诗歌讨论会等大多集中于学院领域的群体性活动与宣传；另一方面则表

现为不时出现于期刊、媒体明确呼吁关注、重视、珍视“诗歌”发展、诗歌价值、诗歌命运的文章或访谈。或许，这种声音最早可以追溯到孔子“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面而立也与！”（《论语·阳货》），而最近的声音，则莫过于《中国诗词大会》这档中国最权威最核心宣传媒体推出的节目。当然，论直接，印象中比较深的还有数年前《广州日报》上刊登的长文《儿童只看动画不读诗很可怕》^[1]。

想想中国历史悠久的“诗教”传统，清末魏源介绍“夷之长技”的《海国图志》，以及近代曾经响彻中国知识界的“赛先生”，我们可以相信，诗与科技的声音其实自古就有，只不过在历史早期，一方因为科技自身发展的相对颓势以及传媒手段的局限，其势头远不能同图像时代的今日相比，或者换句话说，相较于印刷时代诗歌一方的强势，图像声像时代科技一方的声音则得到了空前的扩大与“成功”。

如果说这种各自声音势头上的消长或差异，对科技与诗歌之间关系的说明或展现比较“表面”充其量只是二者未联合，“不和谐”而已，中国社会当下的文理之争则或许是较为明显的“斗争”。

（二）争夺

应该说，文理之争并不是中国社会现在才存在的一种暂时现象，我们所能经验到的身边此时文理之争的现状大概是：以重理轻文为特征，以大学包括中学理科普遍比文科更受家长青睐为主要表现，然而，事实上文理之争自古就有：在最典型的如科举时代，愿意自己包括子女读四书考科举而不是埋头计算、搞发明、做实验的人数，从比例上来说恐怕比今天希望自己孩子学理而非文的不知道多出多少倍。选文还是选理，自古至今这似乎都是一个问题，一个极其明确而又不可避免的问题。选诗作为选文之后的一个后续分支，自然亦不可避免地从一开始就陷入这场争夺。

作为结果,时代发展到今天,我们或许可以说,虽然文科以及诗从没放弃自身的发展,理科、科技终是为自己争取到了越来越多、甚至比从事诗文等人文领域活动人数更多的后备军,生力军,“战斗力”。促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政治的、经济的,甚至宗教的,但在当今中国,如果说重理“轻”文确实是比较普遍,不能否认的是,“轻”诗(人)则是更加的普遍——想想历史上七岁咏鹅的骆宾王、十六岁写下“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白居易,包括当年曾让王安石为之哀伤、五岁即会指物作诗的神童仲永,在其年少之时是何等美誉、何等知名度!而今天,当我们再次说起“神童”时,有几人会将其与作诗联系起来?我们脑中所想到的恐怕不是中小学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物理竞赛金奖也是少年科技班。文理之争的真正战场并非报纸、电视,而是世人的价值判断——韩寒倒确实是个中国当下年少成名的奇迹,不过可惜的是,韩寒无论如何不是诗人,如果他是诗人,甚至如果当年新概念作文时韩寒写的是长诗,他还会如此功成名就吗?在当今社会?难。

(三) 厮杀

现实中的斗争总是残酷的,刀光剑影,血肉横飞,科技与诗之间的斗争也不例外,当然,这种残酷往往不是表现为肉体的支离破碎,而是表现为内在精神的病变、崩溃甚至被摧毁,而且,更为特殊的是,他所摧毁的不是敌人,而是自身之信徒。

虽然我们前文更多地是在谈论科技同诗之间的不同、冲突、斗争,但是我们都明白,现实之中科技同诗其实并非永远泾渭分明、区别独立,而是常常相互交融,甚至融为一体,如用卡拉OK演唱的《明月几时有》《滚滚长江东逝水》——作为单独个体,科技同诗(以及以诗为代表的人文艺术)如影随形之下的共同影响、作用才是常态。而问题在于,对于个人来说,如果一个人真的从始至终只被动或片面地完全接受科技与诗单一方面的“影响”。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不但可能甚至是不可避免地终将被其深深伤害,被科技伤害的例子如:争议美国科学家尼古拉·特斯拉,以及更典型的弗兰肯斯坦等诸多文学艺术作品中走入火魔的科学怪人、狂人——因为对于科技的过度执着或信赖,最终带给自己甚至人类无穷无尽的灾难;因诗而带给自己甚至他人灾难的例子如:现实中过分执着、沉迷于“诗意”“诗境”的理想精神世界,或者过于敏感于世事情感的最终自杀的众多诗人,以及更典型的北村小说《水土不服》中一次次自杀的主人公诗人康生……

我们或许可以说,被科技与诗任一方“完全占据”都是危险的——这一结果有点像某些枪械,其自身过强的射杀敌人能力不可避免地会给自己方带来后座力伤害——我们甚至或许可以预测,科技与诗歌任一方的“完全获胜”都是危险的,因为它们的完全胜利似乎都不意味着人类的幸福,而在这个意义上,科技同诗的斗争则是有益处的,毕竟这种斗争能够更好地保证

我们客观上不会轻易地被某一方完全占据。问题是,这种斗争会持续吗?它们之间的斗争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二、剖析

(一) 起因

应该说,科技同诗歌之间的不和谐甚至斗争,根源于双方的不同。世上互不相同的事物千千万万,确实未必一定意味着竞争或斗争,如果我们仅仅把科技理解为一种“求新、求效、求便捷”的“载体”,一种物质的、外在的、形式层面的“载体”,把诗歌不无偏颇地理解为“求真、求善、求永恒”的精神的、内在的、本质层面的“主体”,科技与诗确实不存在什么对立甚至斗争的可能。无论写在书本上的诗,还是呈现在电子屏幕上的诗仿佛确实看不出什么不和,更不用说斗争的身影,相反,科技似乎极大地帮助、推动了诗歌的发展——真的如此吗?

正如研究文学的人们越来越普遍地认识到文学不能简单地分为“形式”与“内容”,因为“形式”其实何尝不是内容,对某些先锋诗有时甚至形式才是真正的内容,同样,科技也并非简简单单是外在的、形式上的、辅助型的“改变”或“改进”,从来不是!印刷术产生的起因可能是对信息保存、传递效率的“改变”的欲求,但其结果或者其真正的“改变”是信息传播领域——更是人类思想、精神领域的改变,比如,它直接导致了“童年”的产生,这一点波兹曼《童年的消逝》^[2]已经阐释得非常清楚;同样的例子还有:钟表的生产是方便了人类对世间事物、活动的观察、监视以及计划,但无论如何我们都无法否认,即使不是钟表带来,但亦被钟表无限强化的“时间”观念对人类思想、精神领域的影响是如何巨大!诸如此类还有电视、克隆技术、核技术以及我们身边的互联网甚至对于互联网下属的博客、微博技术的开发应用,其“影响”远非简简单单地方便了 we 记录分享各种信息而已。

说到底,我们想说的是正如物质(包括肉体)从不是与精神、心灵截然对立分离,科技无论于形式层面还是物质层面其实都在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思想、精神、内心——而这恰恰也正是诗歌真正存在、生长、发展的空间,而且,不幸的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很多时候科技其本质就是“反诗”的。

(二) 本质

诗的本质是什么?无论我们从文体分类角度把诗定义为“韵语”的艺术,还是参照关于“文学”的主流定义 把其定义为:体现于韵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当然,此处的韵,并不仅指韵脚,亦指篇幅层面语句间那种和谐、轻快令人愉悦的节奏),很显然,除去了外在表现层面有韵或较强节奏感的特征,诗的本质都乃在于“艺术”“审美”,或者更准确地说,乃在于一种非功利、非现世、于精神心灵层面上解放、超越的执着与追求,甚至是于“澄明”状态下对“忘我”“无我”的追求。

究其原因,恐怕则在于人生而注定是拥有爱恨情仇、悲欢离合且永远无法“万事如意”的存在,而且由于死亡是世间最真实最真实的必然境遇,澄明、超越、永恒、无限注定成为作为“有限性”存在的人的所有艺术活动的终极使命。

科技的本质是什么?某种意义上说,科技的本质似乎同样是对“有限性”的超越——更快、更高、更强、更便捷,然而同文艺中的诗歌不同的是,科技的实践空间、作用对象绝大多数情况下都集中于物质包括肉体等非精神情感的客观现世领域,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即使同为“超越”,诗以及同类文学艺术的“结果”乃是主体“忘我”“无我”状态下获得的一种无限与永恒,而科技“超越”之后的“结果”,即使我们设想科技真的实现了现实世界我们所能想到的最伟大成功——“长生不死”“生命永恒”,这恰恰是一种“有我”“唯我”的无限与永恒。这种不同与差异在更切近更现实层面的例子其实比比皆是,小如按摩棒、电动浴足盆,大如摩天轮、磁悬浮列车,包括国际空间站,客观意义上都于不同层面与程度上增强、增加着人们于“现世”的依恋,于“我”之观念的敏感与执着,而艺术、诗歌,尤其能够经受时间考验的成功的优秀的文学艺术、诗歌,很多时候带给我们的恰恰是对于“我”的解放、超越,汤显祖《南柯记》《邯郸记》如此,里尔克《严重的时刻》如此,《红楼梦》尤其其中的《好了歌》更是如此。

一边是“我”在情感、精神、心灵层面的解放与超越,其实质是“我”的不断弱化直至消逝;一边是“我”在物质、现实世界层面的解放与超越,但其实质却是“我”的不断强化直至永生,所以,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不得不承认,科技的本质是“反诗”的,或者诗的本质是“反科技”的——事实上,在现实生活当中,即使是科技几乎已经无处不在的今天,在宗教等少数领域仍然存在着始终明确拒绝现代科技的个人甚至群体,除去那些有名望及没有名望的隐士与宗教信徒,最著名的群体大概就是美国至今甚至拒绝使用电话、电视、电的Amish村庄或者叫阿米什教派!作为非宗教信仰者,我们很难说如此行为的原因是否同诗的使命一样,是源于精神、心灵超越的需求,但可以肯定的是,对于科技的“警惕”,对机器人、克隆技术、人工智能等的“警惕”,在《终结者》《恶童》《人工智能》以及《阿凡达》这些具有明显针对性的艺术作品早已清清楚楚地显现出来。

或许,科技真的本就是与我们心灵、精神世界相对立的存在。

三、需要说明的几点以及结语

(一)我们认为科技同诗在本质上有对立的一面,但并非是从始至终的天敌。双方在某种特殊阶段或层次存在着相互利用甚至相结合的可能(比如在科技仅仅作为一种载体或媒介的时候),而且在实际现实中,尤其当下,结合态几乎近于常态——

这也正是为什么很多艺术作品具有反思现世、超俗、澄明的一面,同时亦有着客观依赖世俗、屈从甚至强化现实感官享乐的一面,如3D电影《阿凡达》,影片本身蕴含着对于现世文明、科技的强烈反思甚至批判,但令人尴尬的是其本身作为第一部大获成功的3D电影,正是当下最现代的电影科技的代表,而且《阿凡达》的面世,直接促生了大量观众以及导演对于3D电影技术的青睐甚至迷恋。

类似的当然还有KTV,我们一面享乐于拥有先进设备、灯红酒绿、喧哗而又舒适的K歌房,一面忘情而又由衷地唱着《相忘于江湖》《一无所有》《滚滚长江东逝水》……

(二)文中提到诗歌“澄明”“忘我”的追求,乃是参照于准意义上的艺术审美之本质,针对于经典意义上的诗歌作品,并非适用于所有诗歌,因为最典型比如打油诗或者启蒙儿童的儿歌,甚至岳飞的《满江红》,其于现实世界的观照远甚于对精神世界的观照,然而,或许也正因为其对于现实世界的观照过于侧重,命运决定了这类诗歌无法成为人类永恒的经典,虽然《满江红》偶尔依然被人们称赞。

(三)平心而论,在这样一个“科技的时代”说科技本质上反诗,不无偏激的嫌疑。作为“科技”甚至理科的“门外汉”,大说科技本质,亦难免多有片面狭隘之处,在此背景之下,本文的意义甚至初衷可能更在于唤起大家对于“科技”的关注,无论如何,科技在深刻“改变”我们身边物质世界的同时,同样甚至更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精神世界。

如果说KTV有生命,它的生命一定是双重的,一重从属于向往超越、永恒的诗的艺术,一重从属于留恋、依附于现实世界的科技,看似和谐的两重生命其实一直战斗着。结局会如何,未来会如何,需要我们更多的探索。

作为一档主流官方媒体的系列电视节目,《中国诗词大会》2016年2月时的“突然”出现,让我们觉得似乎有点“久违”,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它绝不会是诗歌的最后一次呐喊。

注释:

如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版)第313页中关于文学的定义:文学即体现在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

参考文献:

[1]吴波.钱理群:儿童只看动画不读诗很可怕[N].广州日报 2010-10-02(B5).

[2]波兹曼.童年的消逝[M].吴燕荭,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作者简介:田榕,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文学院讲师。

编辑:李光远